



## 忆昔倾谈鬓尚青 ——怀念袁阔成先生

□王充闾

### 初次相遇,心系大“大辽河”

惊悉著名评书演员袁阔成先生仙逝,心中怅憾久之。痛惜我国文艺界摧折一位大师级巨擘,也为自己失去一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感到无限哀伤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一个偶然机会使我幸得和袁阔成先生相识。当时,他在营口市曲艺团,我供职于营口日报社,同在一个城市。可是,由于他整天深入生产第一线和部队基层演出,难得见上一面。这年初秋,我陪同新华社记者前往盘山县一个生产队采访省特等劳动模范、饲养员刘恩田,恰逢他来这里慰问演出,这样,才得机会作了一次深谈。

因为晚上有演出任务,午餐过后,大队便安排袁先生休息。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,得知我属于盘山本地的“土特产”,两年前又曾在这一带下放劳动过,便拉上我谈有关大辽河的轶闻趣事。那时我们都还年轻,他虽然大我6岁,也不过30岁出头,精力十分旺盛,一袭浅黄色中山装,腰杆笔直,面庞方正,双目炯炯有神,透出一股勃勃的英气。

我说,所谓大辽河,指的是辽河千里而来,在这里接纳了浑河、太子河之后的下游一段。这里有过舳舻相接、客商云集的笙歌岁月,但更多的是烽烟弥漫、炮火连天的“乱八地”,是英日俄等列强的角斗场。有如冀中平原,以此为背景可以写出一部《红旗谱》那样的小说。许是出于职业上的敏感吧,听到这里,他立刻眼睛一亮,拍着床板说:“你讲,你讲!”

我说,远的不讲,从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开始,此地历尽了人间苦难,兵连祸结,民不聊生。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日寇入侵,这里的抗日义勇军,青纱帐起,昼夜夜出,使日本关东军和伪军心惊胆丧。老帅、少帅,张氏父子的故事也在这一带流传。解放后,由于生产力得到解放,加上河淤黑土地,土沃水肥,人说“插上一根锄杠,也能够长出庄稼”。但是,每逢雨涝,河水漫溢,顿成水乡泽国。在战胜水灾、发展生产过程中,涌现出许多事迹感人的先进人物。当天要慰问的刘恩田就是其中之一。讲述中,我穿插了一些故事;诸如,为减轻辽河水患,清末举人刘春娘首倡开凿双台河,同营口的英国商会进行顽强斗争;日伪时期,绿林好汉项青山斗勇智斗,枪毙汉奸凌印清;1958年,为发展水稻生产,引辽入双(台河),“三千壮士斩辽河”——作为这场惊天动地的壮举的直接参与者,我们在水寒刺骨的早春,三天三夜不眠不休,同呼啸奔腾的河水搏斗。待到堤坝胜利合龙了,我一爬上堤岸,便喊“渴!渴!”待到乡亲们把碗送过来,我却已经就地倒下,呼呼大睡了。

袁先生听得很投入,直到大队书记推门进来,他才缓过神来,说以后找机会继续聊。

### “咱们庄户院,一切简办”

也算是一种缘分吧,这个机会果真来到了。1965年8月底,报社接到市委通知,抽调我到营口县大石桥镇东窑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(通称“四清”),时间从9月到次年3月,中间跨越春节。听说,这里是市委书记陈一光同志的联系点。

入村之后,我惊喜地发现,袁阔成先生也在我这个工作组。原来,陈书记不仅特别关心袁阔成的政治进步——两个月前,他光荣地成了一位共产党员,而且,对于他的评书艺术极为欣赏,经常鼓励他多说新书,说好新书,为全市文艺队伍树立一个榜样。在工作组全体成员见面会上,组长李介绍过袁先生之后,又向我交代:在开展“四清”工作中,接受实际锻炼,提高思想政治觉悟(此前,我曾几次提出入党申

请);同时,帮助袁阔成收集、整理一些农村素材,充实、丰富其评书艺术资源。说,这是陈书记的意见。

尽管我也从事文学创作,但离曲艺专业很远,怎么竟被“钦点”,分派这样一项任务呢?会后,袁先生告诉我,那次慰问农劳模演出之后,又带队去了矿山、海防,陈书记专门听取了他的汇报。他谈了下一步说新书的打算:要投身农业第一线,进一步深入群众,体验生活;同时,抓紧阅读一些新出版的优秀长篇;响应市委号召,发掘本地(例如大辽河)资源,讲好身边故事。这时,他就提到了我们那次交谈,说要找我帮助,提供一些素材、线索与思路。啊!原来如此。

工作组下分六个组,我们这组五个人,袁阔成和我同睡一铺炕,同吃农家“派饭”,一同下地干活。本组承包的是蔬菜小队,妇女、老年劳力居多,有道是:“前面走着老黄忠,后面一群穆桂英。”由于男人多在镁矿、铁路务工,不像其他小队兼营副业,或者烧窑、开矿,因而清理账目、核查经济问题的任务较轻。我们除了参加生产劳动,就是串门入户,访贫问苦,向社员了解村里情况。当时,纪律十分严明,突出强调工作队必须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,绝对不允许搞特殊化。当时农家饭菜,多是大白菜、小豆腐、高粱米粥;稍微有点差异的,是经领导特批,农家大嫂专门给袁阔成随锅烙上一块玉米面饼,为的是增加一点热量,饭后好给大家说两段评书。怎么称呼呢?社员们习惯叫他“老阔”,不知是谁最先叫出来的。他是市曲艺团团长,“四清”规定一律不叫官衔,而且叫“团长”也觉得隔着一层;叫“老袁”吧,他刚过而立之年,并不老;直呼其名,又显得不太尊重。而“老阔”这个称呼,亲切、得体、老少咸宜,应该说是很妙的。

入村的第三天,午饭轮到了一户铁路工人家庭,房间较为宽敞。摆下了饭桌,收拾过炕桌,就发现窗前、门外挤满了人,有的老头、妇女还上了炕。地面留出空场来,供“老阔”摆架式。房东大嫂依据看到的说书场景,事先摆上个木桌,后面放上一把椅子,倒了一杯茶水,还找出一把折扇,只待说书人“咔嚓”一声打开扇子,便会开讲。可是,“老阔”却全是另一套架式,他亲自动手,把桌椅连同茶杯、扇子挪开,随口说道:“咱们庄户院,一切简办。”其实,即便是在城市剧场,他早已革除了这一套。听说,他在演艺界创造了三个“第一”:第一个让评书走出小茶馆,进入社会大舞台;第一个脱掉传统的长袍大褂,换上中山装;第一个撤掉餐桌、折扇、醒木,改坐着说为空手站着说。

这天说的是《肖飞买药》。看过《烈火金刚》的朋友都知道,故事改编自书中第21、22两回:“五一”反扫荡,隐蔽在小李庄的一批八路军伤病员,急需消毒、疗伤药品,可是,要买药就得进城,日本鬼子监守着城中据点,怎么办?上级经过审慎研究,决定派遣县大队侦察员肖飞前往执行任务。一路上,他先后制伏了特务队长何志武和几个小特务,最后又智斗日本宪兵头子川岛一郎,巧夺脚踏车、摩托车,顺利地闯关越卡,终于把我军急需的药品弄到手中。通过“老阔”的精彩表演,肖飞这一勇敢机智的八路军侦察员英雄形象活灵活现。

尔后的六七个月,得超过上百次吧,“老阔”都像这样,在午饭后或晚上,随地打场,即兴演出;有时还到瘫痪、孤寡老人家里去献艺。演出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新书,而《肖飞买药》《江姐上船》《许云峰赴宴》《舌战小炉匠》等最最受欢迎,可说是百听不厌。一位见过世面的退休老工人说,故事还在其次,就是爱看“老阔”扮演的英雄形象,一身正气,大义凛然。那天,“老阔”刚刚说完《江姐上船》,老奶奶就合掌念佛,说:江

姐、许云峰、杨子荣、肖飞是救苦救难的“四大菩萨”现身的。还有一次,我和“老阔”一道,扛着锄头进菜园子铲菜,发现小记工员正在那里模仿他,说肖飞把烟头摔在狗特务的脸上,“滋啦”一下就烫出一个泡来,狗特务一哆嗦,烟头又顺着脖梗子往下滑,滚到胸脯上,疼得直打激灵。小记工员又学着“老阔”的腔调,问道:“没想到吧,何志武?”对方唔拉了一句,心想:“我想这干啥?碰上你肖飞,这不倒霉吗?”一举手,一投足,作派、声调,活脱脱一个小袁阔成,逗得大家笑个前仰后合。

### 在人物个性上下足功夫

“古有柳敬亭,今有袁阔成”之誉,在我国评书界传播已久。关于柳敬亭,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其本传中记载,当日柳敬亭拜莫后光为师,师傅告诉他,说书应能勾画出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情态。于是,敬亭退而凝神定气,简练揣摩,经过一个月的刻苦磨炼,前来拜见。师傅说:“你说的书,能够使人欢娱喜悦,大笑不止了”;又过了一个月,师傅听过,说:“你说的书,能够令人感慨悲叹,痛哭流涕了”;再回去,又苦练了一个月,师傅赞叹:



沙发,对面有一架老鹰牌的大座钟,一人多高,钟砣“嘎噔嘎噔”地来回摆动,东西两侧有二米见方的两个水晶鱼缸,里边是清冷冷的水、绿莹莹的草,百十条热带鱼,在里面游来游去……他坐在一只沙发上,若无其事地抬起左腿搭在右腿上面,伸出双手,扯平了长衫的衣襟儿,轻轻地往膝盖上一搭,双手自然地放在胸前,两只眼睛悠闲自得地看着缸里的游鱼。”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写肖飞登上川岛一郎的跨斗摩托车,“头闸拱,二闸拽,三闸没有四闸快”;咕嘟嘟,离开药房,冲出东门,再一次经过日军岗哨时,鬼子一瞧肖飞来了,心想:你看怎么样,我就知道是自己人嘛,有急事,把自行车扔在家里,骑摩托来了。肖飞到了眼前,鬼子大喊一声:“乔子开!”(日语,意为立正)肖飞一听,什么?饺子给?燕窝席也没工夫吃了。二者一静一动,一庄一谐,弛张有致。前者写的是激烈交锋的前奏,“万木无声待雨来”,使听众产生悬念与期待;后者属于闲笔,信手拈来,触处生春,令人忍俊不禁。

一次,我和“老阔”坐着大板车往镁矿职工食堂送菜。路上,我们聊起小说写作有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之别,如果是第一人称,当你不在场时,叙述视角就

### 谦卑自抑 处处从严

1948年,袁阔成刚满19岁,在山海关茶社说《雍正剑侠图》。正赶上解放大军入关,他也参加演出接待。当时,军管会一位负责人在他谈话中,肯定了他的热情、才干,鼓励他再上层楼,并建议他读些新时代的小说,尝试着说新书。这样,他就说起了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,“开创了评书说现实题材的先河。”1950年3月,评书《小二黑结婚》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,此后便一发不可收,《灵泉洞》《吕梁英雄传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《红旗谱》《烈火金刚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创业史》《艳阳天》等几十部,相继播出。

1958年他在营口市曲艺团,以《舌战小炉匠》荣获全国曲艺优秀奖。演出归来,他便走出市区,深入工矿、农村、部队。一天,他在海防前线慰问守岛战士,行走在崎岖不平的石路上,看到小战士吃力地背着表演用的桌椅,汗流浃背,很是心疼;当他走进会场,面对战士们一双双渴望与期待的眼睛,恨不能把自己的全部评书家当合盘托出。可是,眼前却被一台木桌隔开了,而且,还要安然坐下。于是,毅然决定,撤掉桌椅,自己要站在战士中间,面对面地表演。这样,一下子就消除了同战士的距离,从而取得了从艺以来最佳的演出效果。也正是从此开始,他断然革新了评书几百年传承下来的以坐相示人、高台教化的半身艺术,转而为手眼身法步全部亮开的全身艺术。

除了袁先生高超的演艺,我觉得最值得看重,或者说最能反映先生本质特征的,还是他的高风亮节,艺品艺德。这里,说的是撤掉场面桌的过程,而我心领神会的却是一位青年艺术家与工农兵心贴心的动人心曲。在我们相处的二百多天中,可以说,每天我都感受到他对农民父老兄弟的灼灼爱意、脉脉深情,以及一种天然的亲和力。他宛如鼓足了前进动力的帆船,浑身注满了政治热情与生命活力,决心要倾尽一己之所长,为人民大众说书献艺。由于从心眼里喜欢,庄户院的诸姑伯叔常常不依不饶,说完一段,还得再说,有的还喊起口号:“好不好?”“好!”“再来一个,要不要?”“要!”立刻腾起响震屋瓦的掌声。这时候,他感到最为开心。他特别看重听众的反应,经常和我讨论,如何抓住听众,特别是抓住年轻人的耳朵,让他们听得进、受感染。而对自己,则谦卑自抑,处处从严要求。其时,他在评书界的首席地位已经确立,可说是誉满神州,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。当听到有人赞颂时,他总是那句话:“不要瞎吹乱捧啊!吹捧不好。”

他是“艺以化人”、“寓教于乐”的忠实维护者,十分反感“听书只图个热闹,只是乐呵乐呵”的说法。他曾听他愤激地指斥(这种情况很少见):“图个热闹——怎么可以这么讲呢?我们不能忘了艺术的价值。”他一贯主张评书是严肃的艺术,提倡高雅,反对粗俗。他尤其重视艺风、艺德,强调“人有人格,艺有艺格”。我注意到,他每次登场,都很重视仪容。即便是在地里干活,休息时应社员请求临时打场,自然来不及换装,但也总要从衣袋里掏出小梳子,拢一拢头发,迅速进入“端乎其形,肃乎其容”的状态。这里反映出,他对于祖国的传统艺术、人民的文艺事业,秉持一种敬畏的心理。

这种内化于心的追求、志趣,支配着、激励着他刻苦钻研、奋力学习。诚然,他的卓越成就的取得,确同“袁氏三杰”的家学渊源、祖传技艺有直接关系,但根本之点还在于他自身的努力。在农村这段时间,他的体力、精力都处在最佳状态。除了像一般工作队员那样干活、开会、同干部社员谈心,还要拿出很多时间表演,付出几倍于他人的汗水与心血,但他从不抱怨,而且多次谈到直接同农民交朋友的收获;当然,个别时候也说过,读书完全放弃了。过后,在几次会面中,他都谈到开卷有益、读书有得的体会。一次,他说,京戏《打渔杀家》是一出“水浒戏”,萧恩就是阮小五嘛!不过我说《水浒传》里可没有记载。他说,类似情况不少,比如《黄鹤楼》和《单刀赴会》,内容大体相同,都是“三国戏”。二者都取材于元人杂剧,但是,罗贯中只选用了后者,所以,《黄鹤楼》不见于《三国演义》。

说到他的学习借鉴,精钻细研,记得有篇文章里讲,他擅长往传统书段里加事添彩。比如,曹操杀孔融,是由御史大夫郗虑(和孔融有仇)告密引起的,这在《三国演义》第40回里有记载,但很简单——郗虑所告发的秘事,无非

是孔融背后发泄不满,说曹公坏话,并且和祢衡有交情。过去,袁先生也是这么照着说的,但总觉得没能击中要害;于是,就考虑往里加些内容。加什么呢?加了郗虑对曹操说:“您还记得您在破袁绍的时候,公子曹丕收了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夫人甄氏,孔融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,信上说到了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赐给了自己的弟弟周公吗?”可别看轻这句话,其中可暗藏机锋。孔融的真实用意,是说,武王把妲己赐给了周公,其实是他自己看上了妲己。但是,由于妲己毁掉了纣王江山,被目为“不祥之物”,如果武王自己纳了妲己,传出去影响不好,所以,便在名义上把妲己赐给了周公,其实是暗地里留给自己。因为只要把妲己收进自己家里,那人家家里什么事,外人就过问不得了。一言以蔽之,孔融是说:现在您破了袁绍,把甄氏赐给了公子曹丕,其实是您自己把甄氏纳了。这可就扎到曹操心窝上了,坚定其除孔的决心。而这种加事添彩,又并非随意而为,大都有根有据。孔融写信一事,见于《后汉书》本传。只是在那里没说是郗虑讲的;袁先生根据情节发展需要,把它放到郗虑身上了。

### 和“老阔”一起“越狱”

不知不觉间,6个多月就过去了。工作组总结座谈中,我说,最大的收获是接受实际教育,获得政治思想上的进步。1965年12月18日,我在里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。期间,听遍了袁先生说的《红岩》《烈火金刚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暴风骤雨》《赤胆忠心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新书中的著名段子,既饱餐了精神滋养、艺术享受,更充分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,也从他那高尚的情操、品格、艺德中,认知了一位艺术家所应遵循的正确道路。这对于一个志在献身文学的青年,是至为珍贵的偏得。如果说有遗憾,就是“帮助袁阔成收集、整理一些农村素材,充实、丰富其艺术资源”这项使命落空了。主要是我缺乏应有的主动性;而他也实在太紧张、忙累了,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说段子,很难找到倾谈机会。其实,即便时间允许,要给一位艺术臻于至境的名家以“帮助”,又谈何容易!当时我曾表示,回去后想法加以弥补,比如,认真写几篇报道,大力弘扬袁阔成同群众打成一片,充满政治热情,说新书,讲艺德,以及刻苦钻研、精益求精的事迹。没有料到的是,回到市里,我就调离了新闻单位,进入市委机关;不久,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而批判“三家村”,新闻单位首当其冲。结果,我又被揪回原单位接受批判。这样,那些报道的构思与设想便付之东流了。

与袁阔成再次见面,是在3个月之后。那天午前九点钟,机关造反派通知我,返回原“四清”单位接受社员批判。上了东窑大队前来接人的拖拉机,一看,“老阔”竟在上面,还有工作组长老李,和进驻其他小队的两名队员。人并不齐,许是临时没有找到吧?我冲着“老阔”卟哧一笑,抱拳问道:“袁兄,别来无恙乎?”他眨了眨眼睛,“哼”了一下,不再作声。这时,我才注意到,副驾驶座上挤着一男一女。

到了大队部,拖拉机就“突、突、突”地开走了。村里喧闹得很厉害,大喇叭震天响,像是两派在辩论,鏖战方酣。这对年轻男女,像是小学教员。把我们安置在一间简屋,他们说去向造反司令交差。屋里没有桌凳,只有几袋水泥和一堆木屑。我们五人站在那里,也不知道“司令”何许人也,只好静静地等待着。已经过午了,也不见人来,门却上了锁。我说:“坐以待毙吧。”“老阔”便问:“往哪坐啊?”逗得大家轰然腾笑起来。就这样,又静等了几个小时。眼看天色已晚,肚子饿得“咕咕”直叫。不知是谁说了一句:“咱们干脆跑吧。”原来,后墙有个方形窗口,上面塞着几片草袋。用手一拉,全部落下。这样,“越狱”行动就开始了。把几袋水泥搬过来垫脚,五人陆续钻出。为了不致被人发现,我们避开大路,穿过收割后的农田,绕到火车站。待到返回市区,已经万家灯火了。

过后,将近3年时间,我在第二纺织厂参加劳动,“老阔”进了市宣传队歌舞连,见面机会不多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一次集会时意外邂逅,当即合影留念,并在当晚作了一次长谈,得偿多年愿望。不久,我便调入省城,而他也进京了。虽然天各一方,晤谈机缘不再,但其潇洒音容,豪迈气度,特别是卓越、超拔的评书艺术,总能从广播、电视里不断地接收到,使我感到十分亲切与欣慰。

